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
《河洛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董延寿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思想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
《河洛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董延寿 张留见 李焕有 鲁庆中 黄黎星 著

河洛思想文化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指导顾问:吉炳轩(黑龙江省委)

指导顾问:连维良(洛阳市委) 张国祚(全国社科规划办)

陈义初(河南省政协) 杨光(国家教育部)

学术顾问:李学勤(清华大学) 汤一介(北京大学)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 李申(中国社科院)

顾问:郭洪昌(洛阳市政府) 杨祥麟(豫运台古物监委)

周宗良(洛阳市政协)

总主编: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编委:(依姓氏笔画为序)

史善刚 安国楼 李晓敏 李焕有

杨祥麟 杨海中 杨晓塘 张得水

张留见 赵金昭 徐金星 梁锦瑞

黄黎星 扈耕田 程有为 温玉成

董延寿 鲁庆中 谢琳惠 薛瑞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思想文化研究/董延寿等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

ISBN 978-7-215-07457-6

I. ①河… II. ①董… III. ①文化史—研究—洛阳市
IV. K29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2106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7.75

字数 460千字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丛书总序之一

这部《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共分六卷,共约 180 ~ 200 万言,撰写计划从 2006 年起实施,经过多位作者集体努力,现已如期成稿,即将付印问世,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丛书的创意设计,出自赵金昭、史善刚两位先生,他们也是全书的组织者。我由于长期与洛阳学术界有深厚因缘,厕名其间,实际没有什么贡献,这是必须在这里说明的。不过我一直认为“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这个题目很是重要,于丛书出版时写几句话以为推荐介绍,是我应该做的,也正是我的荣幸。

近年我写过几篇小文,参与有关河洛文化的讨论,还有若干序跋,从不同角度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回想起来,写这些文章的动因,都是鉴于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日见兴盛,觉得进一步推动河洛文化的探讨很有必要。如我几次谈过的,分区域地论说中国历史文化,固然是古已有之,然而区域文化研究的形成风气,却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学术界深入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源的、多线的,从而各种区域文化进入历史学、考古学等学者的视野,不少还成为学术研讨的热门。尤其是中原以外,曾经在传统上受到忽视的地区,更成为这种研究的用武之地。所谓“中原中心论”的偏向,于是得以纠正。

然而这里还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中原地区同样有其区域文化,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区域文化。记得在 1981 年,我为《中原文物丛谈》作序,便谈过:“中原地区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为众所熟知,但中原和周围地区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从来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为国内各民族所共同创造。……关于中原以外地区文化的新认识,使我们不得不

考虑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究竟还能不能称为中国文明的摇篮？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尽管我们对各地的文化发展有了新的估计，必须认识到，中原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仍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这是由于当文明产生萌长的时期，中原地区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枢纽。”河洛是中原之核心，所以此处说的中原文化即是河洛文化。

现在大家都熟悉洛阳一带古时被称为“天下之中”了。这个观念的起源真是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在当地建都。周武王克殷之后，在选定新邑（即后来的成周）地址时，就是这么说的。周朝宗周、成周两都大势的奠定，成为后世长安、洛阳都邑传统的张本，于历史上意义之大，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到北宋，国都另已东移汴京，当时李格非（李清照的父亲）仍在《洛阳名园记》说：“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足见这一地区影响之长久深远。

中原地区与周围地区，中原文化（河洛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其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认为必须作动态的考察。我们讲的动态考察，大概说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要注意文化的不平衡性。各个地区的文化，总的来看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个或一些地区，有发展上超前于其他区域。比如说上面提到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地区有其特殊的优越之处。

其次是文化的变迁性。文化演进流动不居，各个历史时期在其性质、特征等方面均有不同，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尤其是当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转折关口，变迁的迅速剧烈每每出人意外。

再有是文化影响的多向性。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有彼此影响，而影响一般说不会是单向的。即使在文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后进的文化区域也会对先进的区域产生影响，况且文化差异常常很难说是“后进、先进”。

总之，我们观察和研究像河洛文化这样的重要的区域文化，一定要注意到其在历史上的动态的关系。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正是这样。读者很容易看到，丛书中第三卷《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第四卷《河洛思想文化研究》和第六卷《河洛宗教文化与艺术》，对河洛文化的中心内涵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探索；第一卷《河洛文化

与闽台文化》、第二卷《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还有第五卷《河洛文化的对外交往》,则对河洛文化的衍流与传播重点作出研究。几卷书虽出各家学者之手,却能互相配合呼应,相得益彰。

河洛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如何的重要作用,又怎样演进传播,影响广及全国各地,同时与境内外种种文化融合交流,还有许多深层问题有待今后探讨。希望这部丛书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取得更多更新的成绩。

李学勤

丛书总序之二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说它重要，不仅仅因为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条根脉，而且因为它把河洛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并进而把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河洛文化与寻根文化等有机地联系起来、与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联系起来。台湾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热切期盼。因此，把河洛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联系起来、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与民族和谐联系起来、与祖国统一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就这套研究丛书的基本内容，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河洛文化的传承问题

河洛文化的传承，既包括它在中原地区内的继承与发展，又包括它在中原地区以外的传播与演化。从历史上看，河洛文化对中原以外地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自秦汉以后，汉人逐渐南迁，南迁所到之处，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闽南和广东等地。由闽南渡海又来到了台湾。中原河洛移民从闽南到台湾，带着汉民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开发和建设了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并与当地的民族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闽台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但说到底，闽台文化与中原河洛文化是同根同源的。二者之间完全是一种血缘关系、宗亲关系和源流关系。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的呢？同样是一种宗亲关系、血缘关系和源流关系。所谓“客家”是相对于“祖亲”而言的。“祖亲文化”意指土生

土长、世代因袭繁衍的文化；“客家文化”则指迁徙而来、客居他乡带来的文化。就地域来说，闽台文化主要是指与福建和台湾区域特色相结合的河洛文化，而以河洛文化为母文化的广义客家文化则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如今的客家人，已遍布于亚洲、美洲、澳洲，以及欧、非洲等五大洲之内。不仅在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大国有客家人，而且中美洲的牙买加、千里达小岛、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太平洋的斐济和大溪地等也居住着客家人。据统计，客家人在海外的总人数可达上千万之多。正是这些客家人，带着中原的河洛文化，又吸纳并融合当地的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的客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外的客家文化是河洛文化的一种国际形态。

河洛文化与寻根文化的关系，也是本丛书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寻根文化是指移民们在寻找自己的血统根脉、姓氏起源、先人始祖、家乡故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由于河洛文化是海外客家人的文化根脉，所以，海外客家人自然会通过学习和研究河洛文化作为寻根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河洛文化是海外客家人的寻根文化，也因此，让河洛文化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就有了极大的空间，深化和拓展河洛文化的研究将有利于凝聚海外华人的祖国向心力，有利于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关于河洛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又是居于什么地位的呢？对于此一问题，我们只有从历史上来作一深入考察才能给予回答。从近代的考古发现来看，从新石器时代中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大多数都集中于中原河洛地带。而同这一历史时期相对应的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此观之，河洛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到了夏、商、周三代，而河洛文化又是处于什么地位的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唐人指的是唐尧、虞舜，殷人和周人则指的是殷商王朝和西周王朝。这里所说的三河，就是指河洛地带。从近代考古发现来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确证了二里头文化乃河洛地带夏部族所创造的夏文化，是河洛物质文化遗存在夏代的集中体现；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安阳殷墟的发现、发掘及其数以万计的甲骨文的出现，都

有力地证明,殷商王朝从早期到晚期,皆把都城建在河洛地带的中心区域内。夏和商两个朝代在河洛大地上建起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国家。继夏商之后的是周。周公营建洛邑和制礼作乐,对整个周文化,乃至对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文化和制度,无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先秦诸子,如老子、庄子、墨子、商鞅、韩非、苏秦等等的河洛志士仁人们,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而开创了中华学术史上的辉煌时代。进入汉唐鼎盛时代之后,河洛地带又成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新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发祥地。河洛文化真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第三,关于河洛易学文化的渊源问题

《易经》一书,在古代被认为是古经中的群经之首和三玄之冠;在现当代,又被视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端。作为易学文化的标志来讲就是《易经》,而研究和探讨《易经》的这一学问被称为易学。易学文化历时长达二、三千年之久。《易经》所诞生的时代及其地域,不论从地面文献资料,还是从地下文物资料,皆集中于殷周时代的河洛地带。那么《易经》的渊源又在哪里?其时代和地域又如何辨析?有神话般的传说,又有文物资料的考证,可靠可信的释读又该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史善刚先生所主撰的《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卷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史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来论证和阐明这一问题的。这种研究《易经》的态度、思路和方法应予提倡。

第四,关于河洛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问题

河洛文化虽产生和形成于中原河洛地带,但是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外延,绝非囿于一个地域之内。它所涵盖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它所体现的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辉煌历史。对于河洛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精神,该丛书把它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 刚健自强的“龙战”精神(英勇果敢);
2. 厚德载物的人道精神(宽厚善良);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爱国精神(民族爱国);
4. 和谐统一、和睦相处的和合精神(团结统一)。

这样概括是否准确？是否只有这四条？是否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概括？都可以再思考、再研究。但是该丛书所概括的英勇果敢、宽厚善良、民族爱国、团结统一等四个方面，确实抓住了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多元融合的大文化。上下五千年，中华大地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除河洛文化外，还有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东吴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草原文化、关东文化、闽台文化、西域文化、雪域高原文化等。但是，河洛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内容对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最基本的特征，还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进步、富强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今天，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化研究是很复杂的，若想选好主题，把好方向、拿出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意义的成果来，谈何容易？因此，对“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研究、探讨和编撰的专家学者们，应该表示敬意和谢意。

张国祚

绪 论

河洛思想文化主要是指在河洛地区形成的,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人们也把这种对“知”与“行”的本质及其规律认识的文化,叫做哲学文化或思想文化。

一、河洛思想文化的主要内涵

研究河洛思想文化,首先要界定它所研究的范围。我们认为,河洛思想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易经》的哲学思想;(2)周公的礼乐思想;(3)老子与道家的哲学思想;(4)东汉时期的经学思想;(5)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6)佛教禅宗的哲学思想;(7)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想等。

(一)《易经》的哲学思想

《易经》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易经》作为中国百经之首,从表面看是一部占卜、预测之书,但是,从卦序、卦名、卦象、卦辞、爻序、爻辞、爻象、断辞及其推演过程等方面分析,其中包含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重要思想和原理。

第一,《易经》中包含着“道非常道,有无相生”的宇宙观。

“道非常道,有无相生”是中国哲学对自然界本质的深刻揭示,是对自然规律的高度总结。《易经》以独特的方式把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规律渗透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置于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指导之下。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由道生成的,《易经》中体现这一观点的方法独特而且实用。《易经》六十四卦,每卦都是由三爻一卦的单卦两两相叠而成的重卦,其中的八个单卦也都以自然界八种物质或物质现象命名。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离代表火,坎代表水,艮代表山,兑代表泽,其他相叠的五十六卦也各有

其名,其卦名的字义虽然不完全显示具体物质,但其所代表的内容离不开物质现象。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遵循“道非常道”的发展观。《易经》对物质的发展变化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规律。《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分别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无论从哪一卦哪一爻开始变起,都可变出所有六十四卦。通过这种联系,把本爻所代表的事物,和天(乾)、地(坤)、火(离)、水(坎)、山(艮)、泽(兑)、风(巽)、雷(震)及其他各卦爻所代表的事物普遍联系在一起。

第二,《易经》中包含着“遵道重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观。

正确的人生观,源自于正确的宇宙观(世界观)。树立正确的宇宙观,就要求我们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就是中国道德哲学的遵道重德观念。宇宙观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人生观则揭示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实质是遵道重德。人与人的关系不分民族、国家,不分历史朝代,自始至终表现为君臣(上下)关系,父子(先后)关系,夫妻、兄弟、朋友(左右平等关系),儒学称为“五典”的关系。上下、先后、左右类似于宇宙空间,因而人生观也类似于宇宙观。中国道德哲学提倡以德治国,以德治人,根本在于明“五典”,“五典”之要在于君臣有仁忠,父子有慈孝,夫妇分主次,兄弟分长幼,朋友讲诚信。此品德集于一人之身,具体表现为知、仁、勇“三达德”,欲求“三达德”,贵在好学,力行,知耻,此谓修德之三要,修德之门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三,《易经》中包含“对立统一,负阴抱阳”的辩证法思想。

对立统一和负阴抱阳,是中西方哲学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其实质相同。西方哲学关于对立统一的基本表述是对立双方,相互对立,相互联系,互为存在的前提。中国道德哲学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既分阴阳,说明二者不同是对立,既负又抱说明阴阳不可分离是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冲气以为和,则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既对立却同居一体,既同居一体却为何对立。原因是阴阳双方在消耗自身的同时,既增长了自身的势力,又抑制了对立面的消耗和势力增长。双方就是在这样的消长运动中达到平衡,从而使负阴抱阳的平衡体,能够持续一定的时间。当这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就是事物灭亡的时候,从而构成了万物皆有生命的从有到无的过程。中国人应用对立统一负阴抱阳的规律,表现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地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这也是西方人认为中

国人有独特的逻辑思维方法之所在。

（二）周公的礼乐思想

礼乐制度的确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一些礼乐的雏形。夏、商、周三代,虽然出现了政权更替、国都变迁,但一脉相承的礼乐制度从未中断,而且还因“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乐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更使礼乐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备。周公的礼乐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治国安邦的大一统思想。

周公,姓姬,名旦,文王四子,武王弟。西周建立后不久武王逝世,成王年幼,周公替侄摄政。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掌握实际大权的周公姬旦,大力推行分封制度,扩大分封至71个诸侯国,其中53国为姬姓,封国体现着强烈的宗法血统观念。这些诸侯国普遍带有开拓疆土的任务,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嫡长子世袭更为其注入了活力。另外,西周还有相当一部分爵位的继承者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武王长女大姬嫁给陶正官虞阋父的儿子胡满,胡满被封为陈国(今河南淮阳)诸侯,同时,夏朝的后代、商朝的后代也都被封为诸侯。周公用礼乐把这种包括通过联姻加强的宗法与封建相融合的制度巩固下来,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平衡贵族、诸侯间的权力,确保周天子作为共主的世袭地位。

周公朝读书百卷,夕待贤士七十人。他将古代在河洛大地上形成的天命观念、部族信仰、宗亲关系与君权融为一体,规范着整个社会的行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周礼规定,辅助天子执行权力的三公为最高官职,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之下设六官:天官冢宰总理日常政务,地官司徒掌管土地、户籍,春官大宗伯管理卜祭、礼仪,夏官司马掌管军事,秋官司寇掌管刑法,冬官司空掌管工程建筑。周公又把众多的礼分为吉(祭祀,祭祀求吉祥)、凶(葬丧)、军(检阅、出征)、宾(朝觐、述职)、嘉(婚礼等)五类。祭祀,被列为五礼之首。国君祭祀天下名山,用牛作太牢,对应数字为九;诸侯祭祀封地内名山,以羊做少牢,对应数字为七;卿大夫用猪鸡作祭祀,称牺牲,对应数字为五;一般人只限用鱼,对应数字为三。祭祀的规范仪式体现了鲜明的等级观念。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涉及君臣、父子、性别、言行举止各个方面。有些礼仪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形式,无实质内容,其形式实际代表了一种封建秩序。可以说,礼就是周公为不同人制定的不同的做人

标准,从中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周礼是周代完备的政典,礼的核心是等级造成的差别,又需要借助音乐歌舞,根据内容的不同,演奏于不同的场合。

《吕氏春秋·古乐》中说,周公创《大武》之乐,以歌盛世,壮军威。乐作为感化人心的艺术手段,或激励斗志,或抒发情感,配合礼在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中保持权力最大化,相得益彰,是当时中华文明的完美形式。礼乐有别有和,有尊有亲,相辅相成,互为作用,达到了周公“经国安邦、垂范后世、为万代开太平”的目的。

礼乐文明是在各部落大联盟趋向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周朝伟大的创新。礼乐文明是华夏民族第一次有明确特征的文化积淀,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周公在这一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礼的内容不但包括冠、婚、葬、祭、享、燕、朝聘、衣服、车马和宫室等,同时也包括一切具体的典章制度,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法律规范等。

乐,包括音乐、舞蹈等,它和礼紧密相连。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各有其相应的乐、舞,乐器种类、乐队规模、演奏曲调、舞者人数等都有严格的区别。下不能僭上,卑不能凌尊。

春秋以后,礼乐制度虽然遭到了破坏,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下来。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儒家学说的初基,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历程。周礼规定的政治制度、法律规范,在规范人们的实际行动中,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敬德保民的治国方略。

提倡“敬德保民”,目的是强化西周王朝的统治。商人信仰天命,而武王以忌日起兵,牧野之战,一举克商,使周人对天命产生了怀疑,提出天不可信的思想。周人一面怀疑天,一面又仿效商人尊崇天,表面上看很矛盾,其实不然。实际上,凡是尊崇天的话都是对商人及其归属国讲的,凡是怀疑天的话都是对周人自己讲的。周人自己不信天命,可知道商人相信天命,用天命来统治商人是再好不过的工具。周人把天命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但不敢完全依赖这种工具,于是提出了“敬德保民”思想。周人告诉商人,天所以弃商佑周,是因为商人丧德而周人明德。明德就要保民,明德保民是周人获得天命的根本原因。为了巩固统治,

周人要求自己“敬德”，敬德就是约束自己，使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即要求周人时刻警惕自己，不可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全力控制政权，不给叛乱者以可乘之机。这样天下不生变乱，自然就能保住天命。“德”字在周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这是时时告诫周王朝的统治者，要敬德保民，这的确是周人独有的思想。在关于天的思想上，周人注重修德，强调人力，这确实是一大进步。

“敬德”的实质就是约束自己，保护百姓的利益，加强内部团结。“敬德”的标准就是遵守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即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制度，它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地位和等级特权，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因此，只要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一言一行都合乎礼乐制度，就是发挥了敬德精神，周朝的政权就可以巩固。

敬德保民思想和礼乐制度，是以怀疑天命，注意人力为出发点的，以天命为手段，以敬德保民作为维持政权的目的，从思想上绝不放松统治力量，在实践中以礼乐制度为准绳。这套思想体系和礼乐制度对巩固周朝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影响极大。

（三）老子与道家的哲学思想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史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守藏室史，在洛阳生活了很久，后因周室衰微，他身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而去，不知所终，著有《道德经》一书。《道德经》又名《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上下两篇，共五千余言，传为老子路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坡头北）时所作。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春秋时期，老子最先把道看做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道生万物”的唯物史观。

“道”是世界的本原。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开始推求天的根源，并提出“道”。

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①关于道生万物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什么是“道”,道是超时空的精神性的虚无本体,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③

第二,“负阴抱阳”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论“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最高概括。他提出,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变动不居的原因是天地万物都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揭示出一系列的矛盾,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美丑,祸福,刚柔,强弱,损益,兴衰,大小,轻重,智愚,巧拙,生死,胜败,进退,攻守等。他认为,这些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互为前提。老子还深刻揭示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认为,正常能转化为反常,善良能转化为妖孽,委屈反能保全,冤枉反能伸直,低下反能充满,少取反能多得。中国传统思维中通常所说的“物极必反”,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贵柔”思想。

老子论“道”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贵柔”。他认为,柔可以克强。他反复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④老子提出人们的处世之道要清心寡欲,明哲保身,要做到这些,莫过于“善下”和“不争”。他揭示出事物在运动中强弱可以相互转化,静可以转化为动,柔可以转化为刚,弱可以转化为强。因此,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并提出了以静制动,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少胜多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战略原则。

老子以道作为其思想核心,所以他所创立的学说被称为道家学说,他所创立

① 《老子》第25章。

② 《老子》第42章。

③ 《老子》第21章。

④ 《老子》第43章。

的学派被称为道家学派。道家学说蕴含着睿智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逻辑、行为方式等都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产生于河洛地区的道家学说,成为河洛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老子是公认的道家学说和道家的鼻祖。他长期生活在洛阳,任职东周王朝的守藏室史,负责管理周王朝的图书典籍等。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民心思变。他纵观社会兴衰治乱、历史祸福成败,并融合多种思想观点,创建出自己的学说。

(四) 东汉的经学思想

经学是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家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形成了六经,即《书》、《诗》、《礼》、《乐》、《易》、《春秋》。自此以后,儒生们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六经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所以汉初儒生们凭自己的记忆将原来的儒家经典用西汉用的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今文经。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主要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由于所依据经书的版本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分歧。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反映,古文经学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逐渐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会议,会议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一书。《白虎通德论》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之长,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